

洪霞管 编著

金融话旧

中国金融出版社



中财 B0026782

金融话旧

洪葭管 编著

10285/18

中央财经学院图书馆藏

总号 380825

册号

中国金融出版社

责任编辑：赵燕红

金 融 话 旧

洪葭管 编著

*

中国金融出版社 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新城劳动服务公司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1/32 8.5印张 182千字

1991年5月第一版 1991年5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4000

ISBN 7-5049-0678-6/F·319 定价：3.60元

序 言

金融，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愈来愈显示出它的重要性。人们需要从理论上发展它，从实践上丰富它，促进这一学科的繁荣，并对其历史、现状作更多的了解。为此，不仅要的现实金融问题多加研究，也要从“鉴往知来”的角度出发来谈昔话旧。

金融旧事甚多，我们选择从1840年鸦片战争起到1949年国民党政府垮台止即现在学术界通常称为近代的一百年中的大事进行记叙，因为它更贴近当代的金融生活。这里辑集的三十五篇有关中国近代金融历史的文稿，曾在1987年至1989年的《中国金融》杂志上连续刊载过。刊载以来，颇得读者的好评，不仅富有银行工作经验的老同志喜欢阅看，而且青年同志也很想读后从中知道一些金融界的往事，这反映了广大金融工作者需要了解过去的良好愿望。

近代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金融话旧》从构思上，就立足于如何既能把握住这一根本性命题，又能达到“以古为鉴，今人也未尝不能得到若干启示”的目的，这自然并非易事，需要为之作出努力。作者努力之道，在于三条：一是坚持认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提法具有科学性，因为它明确指出了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的方向；二是以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和不发展作为线索，前

一个论断可以使我们认识在旧中国金融领域，最大的和最主要的资本集中在帝国主义者和官僚资产阶级手里，这一个论点则可以比较符合实际地解释近代金融历史上发生、发展、演变的许多现象；三是注意不能将历史上的事件与人物写得过死，“话旧”如果落入窠臼，读者势必兴味索然，当然写得活也并非脱离史实任意主观臆造，而是致力于从庞杂纷繁的史事中理出头绪，把那些值得探索、重视和借鉴的史实作为话题来进行铺叙，这也可以说是历史专题研究的大众化。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话旧的内容，并非来自个人的经历或他人的回忆，而是源于大量的档案、报刊等文献资料。有了史料的渊薮，才能通过爬梳剔理，去芜存精，言之有物；也只有以资料为基础，才有可能经过推理从材料中得出结论。史话首先必须是可信，这是写作本书信奉的原则。话旧是历史研究大众化的产物，虽不可能一一注明资料来源，但依然需要把史料融会消化，做得翔实可靠。至于驱辞遣意，自应力求简明扼要，避免拖沓。

由于在刊物上登载时，每篇以四千字为限，因此这三十五篇话旧，均以构筑“精致小屋”为追求目标，现在辑集成书，自亦不可能放大为“庞大建筑”，除了必要的补订外，内容和形式均保持原状。金融话旧是写旧事为主，但旧事必连涉到旧人，故本书以写旧人的“金融人物志”十二篇作为附录，以便读者参阅。

从《中国金融》杂志登完这一连载至今已有年余，许多友人饱含对三年“话旧”的情感与愿望，殷殷垂询或敦促“话旧”何日成书或早日成书。“话旧”能成集子，便于已阅者保存和翻检，更可供新读者的择要披览，现幸获中国金

融出版社的慨允，此书遂得与读者见面，这不论对于作者个人或对于金融史研究领域的开拓，都是可以十分欣慰的。

谨向一切关心此书出版和予此书以出版机会的同志们致以诚挚的谢意；亦期待着读者对本书缺点、不足和舛误的指正。

作 者

1990年12月于中国人民银行

上海市金融研究所

目 录

序 言

- 一、古老的钱庄和票号..... (1)
- 二、早期外国资本在华银行..... (8)
- 三、太平天国革命战争时期的金融..... (14)
- 四、汇丰银行的崛起..... (20)
- 五、1883年上海金融风潮..... (26)
- 六、洋务派的金融活动..... (33)
- 七、第一家华资银行——中国通商银行..... (40)
- 八、中国金融业资产阶级的形成..... (46)
- 九、辛亥革命前后的金融..... (53)
- 十、1916年上海中国银行不执行北洋政府的
“停兑令”的始末..... (60)
- 十一、“南三行”——没有组织形式的联合..... (67)
- 十二、证券交易所的出现和“信交风潮”
的发生..... (74)
- 十三、“北四行”与四行联营事务所..... (80)
- 十四、国际银行团与大借款..... (86)
- 十五、1926—1927年间的金融业资产阶级..... (93)
- 十六、公债与金融业..... (99)

十七、联合准备委员会和票据交换所·····	(106)
十八、废两改元·····	(112)
十九、白银风潮·····	(118)
二十、1935年的币制改革(上)·····	(124)
二十一、1935年的币制改革(下)·····	(130)
二十二、“四行两局”之首——中央银行·····	(137)
二十三、“四行两局”的二把手——中国银行·····	(143)
二十四、居“四行两局”第三位的交通银行·····	(149)
二十五、抗日战争时期的金融·····	(155)
二十六、抗日战争时期的外汇政策的演变·····	(164)
二十七、四联总处·····	(170)
二十八、日军刺刀下的三家银行·····	(176)
二十九、五亿美元借款及其运用·····	(182)
三十、抗日战争后的金融态势·····	(188)
三十一、统一的上海证券交易所·····	(194)
三十二、开放外汇市场·····	(200)
三十三、抛售黄金与“黄金潮”·····	(206)
三十四、法币崩溃与金圆券出笼·····	(212)
三十五、半殖民地半封建金融告终·····	(218)

附录：金融人物志

一、盛宣怀·····	(225)
二、叶揆初·····	(228)
三、张嘉璈·····	(231)
四、李 铭·····	(234)
五、钱永铭·····	(237)

六、陈光甫.....	(240)
七、周作民.....	(243)
八、吴鼎昌.....	(246)
九、谈荔孙.....	(249)
十、徐新六.....	(252)
十一、王志莘.....	(255)
十二、秦润卿.....	(258)

一、古老的钱庄和票号

金融活动一般是指与货币流通和信用、结算活动有关的一切活动。从历史上看，有了货币就逐渐有了金融活动，包括货币的兑换、保管、汇兑以及货币的借贷。有了金融活动，也就会逐渐产生专门从事金融活动的机构。中国古代从事信用活动的金融机构，曾经有典当、柜坊、钱铺、钱庄、银号、票号、帐庄等，但到了鸦片战争后的近代金融历史上，仍能起相当大的作用的则是钱庄和票号。

（一）钱庄和票号的产生

我们说“古老的”钱庄和票号，因为它们在古代时已经存在，相对于新式银行而言，它们就是老资格的金融机构了。

钱庄，是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出现的一种信用机构，它起源于货币兑换，并因经营货币兑换而引起贷款和存款业务。这种货币经营业，开始时也有由商铺兼营的，后来便由专门机构经营了。在明朝万历年间及稍后时期的书籍中已有钱店、钱铺、钱桌的名称。在汉语用法上，庄一般比店、铺规模大，所以初期称钱店、钱铺，后来经营范围扩大了，就改称钱庄。

钱庄是否产生于明朝？仍是一个被否定的命题。因为迄

今为止，还未发现明朝官书、文献或当时的人所写的小说、笔记中有钱庄的字样。过去有些学者推论明朝已有钱庄是根据《隔帘花影》第三十六回：“来旺一向得了南宮吉的本钱，在河下开了酒饭店，又卖青布，开钱庄，极是方便。”但是现在文学界已有人作了考订，《隔帘花影》并不是明人著作，它是根据《续金瓶梅》改写而成的，而后者成书于清朝顺治十八年（1662年），则《隔帘花影》最早也得在康熙年间问世。所以钱庄产生的年代还只能推断为清初。

从目前发现的资料看，上海的钱庄在清朝乾隆年间已经成为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独立的行业。上海钱业公所那时就设在城隍庙毗邻的豫园里面的内园。现在还保存着的《内园碑记》记载着：乾隆四十一年到嘉庆元年（1776—1796年）历年承办该公所事务的钱庄先后共有106家之多。嘉庆二年刻的一块碑上镌刻着钱业公所的董事名录。这样一个早在1776年就有同业公会组织的行业，如果不经数百数十年的时间，也就不可能发展到这样的规模。

另一则资料也表明至迟在乾隆初年已有钱庄。乾隆十年（1745年）福建巡抚周学健在上给清廷的奏折中说：“但铺户奸良不一，应飭各州县查明该处钱庄若干，钱铺若干，造册。即令派查钱铺委员，稽查有无抬价。”在官方文献中出现钱庄名称，而且把钱庄与钱铺区分开来，这正好有力地说明，钱庄是由钱铺演变过来，资力较大、存放款业务较多的钱铺往往改组成为钱庄，而在钱庄出现之后，也依然有营业以兑换为主的钱铺的存在。两者同时并存一个时期，是合乎事物发展情理的。

沿海城市，居民稠密，贸易频繁，金融活动亦就增多。

鸦片战争前，钱庄已在江苏、浙江、福建等沿海商业城市兴盛起来，以后长江流域商业发达各埠也成为钱庄发展较快的地区。

与钱庄同属旧中国早期重要信用机构而且资力雄厚超过钱庄的是票号。据有关资料推断，道光初年（约在1821—1824年之间）出现了第一家专营汇兑业务的票号，这就是山西平遥人开设的、由西玉成颜料号改组而成的日升昌票号。著名的山西商人，足迹遍于全国各地，最初一批改为专营票号的商号，都是山西人经营的颜料业、茶庄业、烟草业、盐业、布业和冶铁业。票号的出现，是为了解决两地之间贸易货款交付时的运现困难，改为使用汇票后就可以解决异地商品交换的支付和清算问题。鸦片战争前夕的1837年，全国已有票号七家，并且还有不少分号。

总起来说，钱庄和票号都是由于商品流通扩大对于货币流通有了新的要求而产生的。随着货币的兑换、汇兑、保管等业务的发展，货币所有者投资于这种独立的货币经营业，便产生了早期的钱庄和票号。

（二）社会经济急剧变化中，钱庄票号的发展、演变

鸦片战争后，社会经济迅速变化，作为金融业的钱庄、票号也随着变化。

钱庄的业务是广泛的，既办贷款，又收存款，也可间接办理汇款，经营方式也很灵活，自己资本额小，还利用别人的资金。它有一套信用手段，对丝、茶、粮、棉等贸易提供金融服务，能在流通领域里起促进商品交换的作用。以最有代表性的上海钱庄为例，1843年上海对外开放后，业务有所发

展，家数不断增加，1858年时已有大小钱庄一百多家。在外国资本入侵后，钱庄为什么未被削弱或受影响，其原因即是它的一套信用工具和业务做法，适合于外国资本的洋行推销商品和搜购原料的需要。其中最重要的是运用庄票。庄票，是钱庄签发的由它本身支付一定金额的票据，分即期和远期两种，即期的应见票即付，远期庄票(最长为二十日)则可在到期日兑付。当洋行发现庄票能够进一步打开输入商品的销路时，就积极地加以利用。通过使用庄票，中国批发商人向洋行购买货物不必先付现款，货物到手后尽速设法出售，所得价款就可用来偿还钱庄的债务，第二次又可向钱庄申请出给庄票，再向洋行购货。到了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中外贸易的闸门进一步打开，洋行利用庄票开展贸易的范围就更为广泛。钱庄资本不足，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依靠外国银行的拆款，其间也有一段时间还运用票号对它的拆款。一家钱庄资本只有二、三万两，而拆借来的款项有达数十万两的。但是如果外国银行不收受它的庄票，不拆款给它，钱庄的生存就要受到威胁，从这一点说，它对外国资本的依赖性是比较大的。

票号在鸦片战争后的一段时期里仍以经营汇兑业务为主，那时候它是以商人、商号为对象，发展也较快，到19世纪50年代終了，家数增为十二家，每家已有分号几个乃至十几个，分布在二十几个商业城市。由汇款而产生的金融周转，包括因预收汇款而形成的存款和预付汇款而形成的放款也逐渐增多。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即太平天国革命时期，由于战区扩大，道路阻梗，清朝政府虽然一贯严厉禁止各地公款由商号承汇只准运送现金，这时也不得不允许交由票号汇兑了。不仅政府机关，而且官吏个人亦多托票号汇

款，承汇政府机关和官吏个人的汇款，逐渐成为它的主要业务。

票号比钱庄有利的是可以运用遍布全国的分号进行汇兑业务，不需要往返运现，而是可以用两相抵销和多边划转的办法，来求得现金运用的平衡。票号活动遍及全国，虽然它的重心在北方，但也兼及南方。钱庄的发展以长江流域一带为中心，业务往来以商人和商业为主要对象，钱庄营业对象的重点在本地区，外埠不设分庄，虽然它也可委托异地同业间接办理汇解，但在全国性汇兑上作用就不如票号。

票号承汇公款汇款后，又通过为清朝官吏垫付上任川资、代垫捐官款项和向官府直接捐纳报效等，使两者的关系进一步加深。它的北京分号的经理经常出入于王公大臣之门，省会所在地分号的经理也频繁地往来于总督、巡抚等衙门；有的督抚由东北调往四川，这位经理也随之调至四川分号任经理。此后，票号不仅汇兑公款，为户部解缴税收，而且充当清政府筹集经费的办事机构，为各省各关代垫京饷和协饷，以解救清朝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财政危机；并且还为清政府筹借外债和汇解外债，乃至代理部分省、关的财政金库。据不完全统计，1894到1911年各票号承汇各省、关公款达一亿四千多万两，其中汇往上海的占九千四百多万两。业务的发展，带来了机构的增加，到了二十世纪初，票号多达三十几家，在全国有四百多个分号，并且短时期还在日本、俄国等地设立分号。

钱庄为合伙组织，资本每家只有几万两，票号有独资经营，也有合伙经营，资本一般为二、三十万两，多的三、四十万两。钱庄盈利一年一结，全数分给股东，不注重资本积

累；票号每三、四年结盈一次，盈利分配除给投资人以“银股”外，还给职员以“身股”，但平时对职工待遇甚为苛刻。不论钱庄或票号，均缺乏资本主义企业那样重视积累的制度；由于它们均未认识和办理储蓄的重要性，也限制了它们对社会货币资本的积聚和集中。

（三）钱庄、票号的不同结局

票号和钱庄，都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都是货币经营业，又都是新式银行出现前金融业的两大支柱，但它们最后的结局却有很大的不同。钱庄虽然亦常受挫折和发生危机或风潮，但没有象票号那样最终陷于衰落而被淘汰，辛亥革命时社会经济巨大动荡，依附外国资本的钱庄不会受到根本性的影响，它一直延续到全国解放，有的还参加全行业公私合营。而票号在辛亥革命后受到致命的打击，从此一蹶不振。不仅政府的存款、汇款等特殊业务丧失殆尽，数额颇巨的关内外汇兑由于关内对关外的协饷停止也无法承做，受政局影响而呆滞不能收回的贷款更是为数累累。既丧失了营业的基础，又遭受巨大赔累，等待着它的只有衰败一途。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正是新式银行和钱庄的黄金时代，但票号却已无法挽救它的衰败，终于走上整个行业均归淘汰的结局。多方结交官府，与政权建立特殊深切关系，曾经是它兴盛的原因，也是它灭亡的根由。

（四）钱庄、票号的历史地位

票号和钱庄，虽然在经历盛衰之后，一个在中途被淘汰，一个在后期力量也日渐削弱，但是它们在中国金融史上

的地位是不会被抹掉的。

首先，它们曾经在社会经济发展中起过一定的作用。它们既然是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产生，它们的众多机构和信用工具也必然会在一定范围内起了资助商人、促进物资交流和扩大国内市场的作用。其次，它们的一套信用手段，包括票号在汇兑业务经营上的各种做法，钱庄的卓有成效的汇划制度，使用庄票，灵活的利率和其他行市的掌握和运用，对调剂金融和活跃经济都有积极影响。再次，它们率先涉足在金融这块园地上，为未来的新式银行提供了人才和各种可资借鉴的经验。尽管它们都没有能发展成为银行，新式银行是用股份有限公司形式集资筹办起来的，但它们特别是钱庄也与新式银行并存了相当长的时期，它们的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已成为历史的遗产，为新式银行的肇始创造了良好条件，它们虽不能被看作是中国银行史的扉页，但它们确实是中国近代金融史的重要篇章。

二、早期外国资本在华银行

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没有银行，只有钱庄和票号；鸦片战争后不久，19世纪40年代中期，就有一家外国资本银行进入中国；稍后，50年代有四家英商银行来华设立分行；60年代上期，又有五家英商银行和一家法商银行在中国出现。我们把1845—1865年进入的银行称之为早期外国资本在华银行。

（一）丽如——最早开设在中国的外国银行

英国是世界上资本主义最早发达起来的国家，被称为“世界工厂”的英国，1820年时占了世界工业总产额的一半。随着工业的高涨，规模日益巨大的企业投资已非单个资本家所能承担，股份公司形式的企业就产生了。这种股份企业在金融业中发展也十分迅速。1841年，英格兰和威尔士在321家私人银行之外，已有115家股份银行。这种股份银行的潮流，也从西方涌向东方。英国和印度合资的西印度银行（Bank of Western India）于1842年出现在印度孟买，不到三年，总行迁到英国伦敦，更名为Oriental Bank（原应称为东方银行，由于以后它的上海分行称作丽如银行，丽如就成了通行的中文名称），于总行迁英的同一年即1845年，就在香港和广州设立分支机构，成为最先闯入中国的外